

现代政治里，皇权除了在寥寥可数几个国家仍保留虚名外，基本荡然无存。在普选制的民主国家，政府合法性的规则很清晰，就是按得票率多少来定输赢。

内生性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政权，如前苏联、中国、越南、前南斯拉夫、古巴等，也包括中华民国、南非、印度、印度尼西亚、土耳其等，其第一代领导人是“打天下的”，革命的胜利就是他们执政合法性的来源，这基本没有疑问。唯一的问题是建党和执政所要求的能力很不一样，即所谓“打天下易，坐天下难”。成功的革命家把国家治理得一塌糊涂的比比皆是，李光耀那样的全才几乎举世无双。

社会主义同皇权相克：执政的共产党是无神论者，君权神授这一套行不通。先锋党的理念又同普选民主格格不入（落后的民众怎么可能选出先进的政党？）。怎么办呢？这就须要引入“绩效合法性”的概念，就是要靠执政成绩来维持合法性。这里两条路线可走。

第一条是对老百姓全面灌输执政党的意识形态、理念和价值观，使他们认同党的远大理想和近期目标，从而实现“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”，无论党要干什么，全国人民都紧跟照办，乐于付出和牺牲。同时也使他们相信形势一片大好，天天都在放卫星，生活比蜜还甜。这是中共在毛泽东时代的选择，也是朝鲜的现状。

但这条路线有两个问题：首先是需要闭关锁国，尤其是封锁外部世界的信息，以便在国内垄断话语权和对全民进行思想改造。其次，缺乏民主监督的官僚体系会大规模地产生腐败、特权和脱离群众的现象。这些同官方天天宣传的共产主义精神和英雄模范事迹背道而驰，引起广泛的不满情绪，也在党员干部队伍中催生了大量的两面人和投机钻营者。

中国聚焦 郭良平

另一方面，锁国必然导致落后，落后则必然挨打，这是中国近代史的主要教训，因而改革开放是必然趋势。可是一旦开放，这条路就走不下去了。开放初期的内外认知反差，导致了信仰危机的总爆发，一种长期被欺骗的感觉，顷刻化为不分青红皂白的反共情绪——党内外都是如此。这才是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一夜间崩溃的主要原因和心理机制。

第二条路线是中共改革开放以来的选择，即放弃计划经济，通过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来实现现代化，在发展速度上赶超资本主义和其他发展中国家。三四十年来中国在这条道路上突飞猛进，俨然已是一个崛起的超级大国。与毛泽东时代的空中画饼不同，这种绩效是实实在在的，落在民众的口袋里的，落在人民生活水平指标上的。各种民调都显示，中国政府的支持率一直名列世界前茅。

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治体制的问题已经解决了。比如腐败仍在，而且比毛泽东时代严重得多；两面人和投机钻营者仍在大量繁殖；小人和太监文化仍然猖獗，近年来告密在一些人群中又流行起来，冲击做人的底线。新的问题包括贫富分化，寡头垄断，黑恶势力抬头，道德滑坡，社会诚信缺失，就业和医疗问题，环境和食品安全问题等等。经济增长持续放慢，可能会使这些上升为政治问题，使有赖于人民获得感的第二条路线逐渐失灵。

以上是政党层面上的合法性。在领导人个人层面上，情况又有所不同。如上所述，第一代领袖的权威是长期奋斗中形成的，在执政党内外都没有大问题。但当打天下和治天下的能力不匹配

中国政治如何现代化？

的时候，矛盾就出现了，党内就会有不同声音和派系斗争。一个常用的解决办法就是“伟大领袖模式”。

这个模式有诸多方面，最主要的是将最高领导人打扮成神一般的存在。

其次是清党——全面清除反对派和可能的挑战者。历史上这个过程相当残酷，例如斯大林三十年代的大清洗，从肉体上消灭掉了十月革命的几乎所有其他领导人；军队近九成高级将领被处决，导致卫国战争初期红军的大溃败，几十万上百万地被纳粹德军围歼俘虏。“残酷斗争，无情打击”就是王明从苏联带回中共的。第三个方面是将和平时期的建设也当成革命运动来推动。

搞运动是创始人的强项，没人能和他们比肩，而且执政党的组织就是为搞革命运动设计的。如毛泽东坚持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”，大小运动一个接着一个，直到他去世从未间断。他认定刘少奇和邓小平领导下的党政官僚体系，是“新资产阶级”的土壤，强调“阶级斗争要年年讲，月月讲，天天讲”。他称中宣部为“阎王殿”，号召人民起来“打到阎王，解放小鬼”。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，是他革命生涯的巅峰之作。做为照耀在一片红旗的大海洋之上的“红太阳”，他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。

个人崇拜遗患无穷

然而对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来说，个人崇拜危害极大，遗患无穷。

过去的皇帝只要血脉正统，上位程序合法，就是个傻子也不打紧。人们对皇上有敬畏而无崇拜，治国主要靠大臣的经验和智慧，靠典章制度和传统，靠圣人先贤的古训和儒道佛的典籍。而

“伟大领袖模式”却要求最高领导人无所不能，无所不在，无处不是最高权威，集哲学家、思想家、战略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、诗人、历史学家、经济、政治、社会学家、法学家等为一身，斯大林甚至还出版过语言学专著；朝鲜的金氏祖孙三代都以文艺创作著称。他们讲话必须一句顶一万句，句句是最高指示。换言之，过去皇上的位置，今天只有神仙才能胜任。

但现代人都是凡人，都有缺点和不足。将凡人推上神的位置，强迫全民顶礼膜拜，就是将一个人的短处变成整个民族的短处，将一个人的局限变成一个国家的局限；就是用一个人的水平来限制全体人民能够达到的高度，用一个人的思想来禁锢所有人的独立思考。

这个模式的危害性，在创始领袖一代故去后更大。首先，执政党可以靠政绩来维持执政的合法性，但执政党内部的个人却无法靠政绩来取得权威。这是因为大家都是按部就班提拔上来的，除了运气和人脉外，都是半斤八两。每个人上位都伴随成百上千资历、能力相同甚至更强的人的不服。

没有公认的突出能力和政绩，树威信就得靠权势压人，靠搞个人崇拜，靠到处硬充权威、出书立说并强迫全党全国当圣经来学。但大家都心知肚明，口服心不服。于是怠政、不作为、等着看笑话，甚至脚下使绊子，给国家造成损失。

其次，因为后代“伟大领袖模式”是硬性拔高，所以须要大量吹喇叭抬轿子拍马屁的庸才，需要提拔大量亲信。这就会扩大两面人和投机钻营者的市场，恶化政治生态；也会得罪许多人，使“高级黑”和“低级红”层出不穷，

威胁到政坛的稳定。

邓小平就很清醒，他指出中国的长治久安必须依靠制度，而不是将宝压在某个人身上。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混合体制有很大的优越性，但还不定型，须要认真总结提高和创新。但中共近年来却在向第一条路线回归，恢复了毛泽东时代的许多做法，例如强化信息封锁和言论控制，加强宣传和扩大政治思想教育，强调听话和绝对忠诚，重建党的一元化领导、推行以党代政，发扬光大红色文化等，个人崇拜也不时兴风作浪。

这里的一个误区，是将改革开放的成就归功于本原体制，而不是对这个体制的改革；是将“不忘初心”当成恢复原装（可能夸张了一点）。政治上的回归必然导致经济上的倒退；政治改革的停滞必然造成市场化改革的裹足不前，在国际上的反响则是新冷战——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。

政治改革的核心是实现现代化。政治现代化最本质的特征并非大选，而是理性化和世俗化。理性化就是一切按科学，按道理，按常识，按制度、议事规则和公认标准来办，就是论事不论人。世俗化就是抛弃“伟大领袖模式”，在法律、制度、程序和公理、常识、良知面前人人平等。两者都不必然牵涉到向西方制度靠拢，都包含开创性的前景。

而“伟大领袖模式”则强调盲从和愚忠，在过去是封建的，在现在是反现代化的。制度建设应该遵照现代化的标准做长远筹谋，而不是围绕一时的政治需要来算计。只有这样，中国的政治改革才会有章法；近些年建立起来的规章制度、法律、纪律和规矩等才会有灵魂；政治生活才能实现良性互动，变得生动活泼和富有成效。

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
东亚所高级研究员